

热风时节

董之林 著

——当代中国『十七年』小说史论（1949-1966）下

董之林 1952年生于北京，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审。著有《走出历史的雾霭》（新时期知青小说论，1991）、《追忆燃情岁月——五十年代小说艺术类型论》（2001）、《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2004）、《豎尺集》（2008），译著《接受美学理论》（1993），并发表论文，评论和译文多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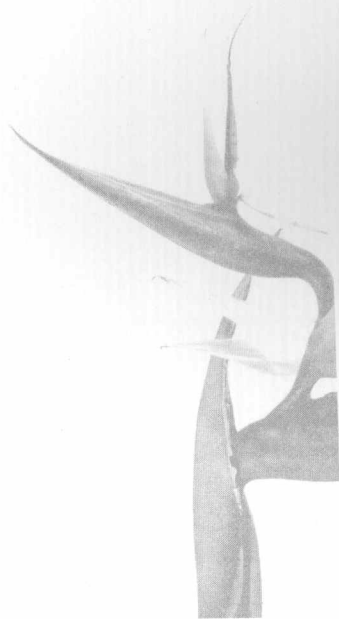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热风时节

董之林◎著

——当代中国『十七年』小说史论（1949-1966）下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热风时节:当代中国“十七年”小说史论:1949~1966 /
董之林著.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 12
ISBN 978-7-80678-985-8

I. 热... II. 董... III. 小说史—中国—1949~1966
IV. I207.4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55065号

责任编辑 陈琪

封面设计 张志全

技术编辑 丁多

热风时节:当代中国“十七年”小说史论(1949~1966)

董之林 著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www.shsd.com.cn)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经 销 全国各地书店
印 刷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15.875
字 数 345000
版 次 2008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78-985-8/I·217
定 价 32.00元

第五章 “调整时期”的小说与知识分子话语(1960—1966)

第一节 概说

1

“大跃进”与浮夸风——调整时期的文艺政策——《海瑞罢官》——李何林总结十年“一个小问题”——《燕山夜话》与新编历史剧——历史小说兴起——“大连会议”与“写中间人物”——两个“批示”

第二节 浪漫年代的不和谐音:悲天悯人的艺术情怀

19

向古典回眸——《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酒及药之关系》和《故事新编》的启示——《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杜子美还家》——《白发生黑丝》

第三节 写在暴风雨前的乡间小品

35

游走在政治理念边缘——“大传统”与“小传统”——《赖大嫂》——《出山》——《山区收购站》——《“老坚决”外传》——《归家》

第四节 表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小说模式

52

重提“阶级斗争”——《现代修正主义的艺术标本——评格·丘赫莱依的影片及其言论》——“撒播和移植的原则”——《艳阳天》——《风雷》——《沸腾的群山》——革命传统教育与《红岩》——《欧阳海之歌》的结构方式

第六章 亦新亦旧的“新时期”小说

80

“拨乱反正”的小说主题——“新时期”文学与“旧时代”痕迹——“改换文学”——《班主任》与《伤痕》——文坛两部分作家:“知青”与“中年知识分子”——从“伤痕”

到新理想主义潮——《晚霞消失的时候》——《在小河那边》——《蹉跎岁月》——《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西望茅草地》——《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本次列车终点站》——《黑骏马》——《棋王》——与“十七年文学”密切相关的“中年知识分子”写作——人道主义精神与“颓废派艺术”辨析——《大墙下的红玉兰》——《悠悠寸草心》——《布礼》与《洗礼》——《芙蓉镇》——《立体交叉桥》和《钟鼓楼》——《挣不断的红丝线》

第七章 宏观背景下的个案分析

第一节 关于“十七年文学”的历史反思:以赵树理小说为例 118

本土文学的边缘性体验——郭沫若谈“自由的环境”与“实事求是的精神”——从《李家庄的变迁》到《灵泉洞》——让中国农民分享现代思想果实——“一定要有曲折的故事”——说不完的家长里短、道不尽的蜚短流长——汪洋恣肆的细节——竹内好谈“茅盾的文学”和“赵树理的文学”——不屈从任何“限制的过程”

第二节 周立波小说的唯美倾向 149

偏重主观体验的表达方式——追踪世界文学潮流之变——唯美与革命文学的瓜葛——实践现代文学的自律性要求——《暴风骤雨》与“新人”观念——角色转换的关键:语言——《山乡巨变》与《山那面人家》——回归自然的人生

第三节 回想“春暖时节”:一份大跃进年代的女性写作个案 176

跳出“妇女解放”的意义阐释结构——与鲁迅、庐隐笔下不同的女性形象——工农兵时代,风风火火性格中的现代性诉求——两种女性性格的互文比较——接受环境与作品倾向——“杯水波澜”中含蓄、内敛的传统之美

第四节 观念与小说:关于姚雪垠的五卷本《李自成》 188

启蒙与新史学运动——索罗门的瓶子——“深入历史”

和“跳出历史”——潼关南原大战与阿英的意见——三足鼎立之势——“三分天下”的历史格局——多维互动的情节描写——“生于末世运偏消”的崇祯王朝——皇太极的“美人计”——李自成的悲剧

第五节	王蒙与《王蒙自传》：以写作反抗“幻灭”与虚无	217
	从世道大变的激动中“冷静下来”——《王蒙自传》的写作先兆——青春心理反弹：割不断的历史——关于《怎么写》——“生活在别处”——“原罪”与人之情和人之常理——文艺作品的“假中见真”——历史“褶皱”——以写作自救的“局外人”和知识分子的“相对自主”	

结语	“历史”背后——关于当代文学研究中历史相关性问题	232
----	--------------------------	-----

后记		250
----	--	-----

第五章 “调整时期”的小说与知识分子话语 (1960—1966)

第一节 概述

五十年代末，反右倾运动使社会上“浮夸风”愈演愈烈，由此而来的是在经济建设上说假话、空话和大话所造成的巨大灾难。据资料统计，1959年的粮食产量仅为3400亿斤，比1958年实际产量4000亿斤减少600亿斤，而当时却被估计为5400亿斤，认为比庐山会议公布的（实际也是浮夸的）1958年产量5000亿斤增加8%。由于估产偏高，当年征购粮反比上年增加173亿斤，达到1348亿斤，超过实际产量1/3。1960年粮食产量进一步跌为2870亿斤，比1959年又减少530亿斤，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棉花也跌落到1951年水平，油料跌落到四十年代末期水平。轻工业生产急剧下降。1960年

同1957年相比,城乡平均粮食消费量减少19.4%,其中农村人均消费量减少23.7%^[1]。

1960年10月开始,为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五风)造成的一系列重大失误,中共中央发出《紧急指示信》。毛泽东在一个批语中写道:“毛泽东同志……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2]1960年8月,中共中央在研究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时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并在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

于是,一个调整时期开始了。与经济上的调整相呼应,文化领域各项工作也进行调整。1961年6月1日至28日,中宣部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文化部同时召开故事片创作会议(简称“新侨会议”);中国戏剧家协会于1962年3月在广州召开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简称“广州会议”);1962年4月中共中央批发了中央宣传部和文化部党组、文联党组提出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十条,后改为文艺八条);1962年8月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召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简称“大连会议”),这些会议和条例“在当代文学思潮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和意义”^[3]。

会议和条例的中心议题是调整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1957年反

[1]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381页。

[2] 中共中央1960年11月28日转发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的批示,转引自《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383页。

[3] 朱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377页。

右斗争以后，拔“白旗”批“白专”道路，破“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在知识分子中“进行了许多过火的和错误的批判。有些文教单位的党员干部甚至认为知识分子既然绝大多数属于资产阶级，他们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对象。1958年12月毛泽东在一份反映这一情况的材料上批示：将此件印发给全国一切大专院校、科学研究机构、文化艺术团体、新闻出版机关的党委、总支、支委阅读和讨论，‘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1958年12月22日给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的批示）。按照这个精神端正对知识分子工作方向的努力，被‘反右倾’斗争打断了。这些条例的制定和执行，则是这种努力的继续”^{〔1〕}。特别是在1962年3月召开的有关科技工作和文艺工作的广州会议上，周恩来和陈毅的讲话肯定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而不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陈毅说：“经过十二年的考验，尤其是这几年严重困难的考验，证明我国广大知识分子是爱国的，相信共产党的，跟党和人民同甘共苦的。八年、十年、十二年，如果还不能鉴别一个人，那共产党也太没有眼光了。”他宣布给广大知识分子“脱帽”（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冕”（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2〕}。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反右斗争以后的紧张局面，“当时有的知识分子说：‘希望把这些条例刻在石碑上。’这句话代表了他们拥护这些条例，希望政策不要再变的殷切而又隐含着担忧的心情”。

〔1〕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388页。

〔2〕 同上，第389页。

在此形势下，从1960年到1964年前后，文学也出现了短期的活跃局面。值得注意的是，这时一批学者型作家在文坛联袂出现，使过去由于片面强调“工农兵文艺”和阶级斗争，动辄上纲上线，使知识分子三缄其口的文坛有所改观。虽然这已不是五十年代初的“早春天气”，却也预示“十七年文学”又将出现一个短暂的春天。尽管“党中央对思想政治上的‘左’倾观点没有作出彻底清算，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在党中央内部有少数人不同意甚至明确反对”^{〔1〕}，但这一时期在调整政策的鼓舞下，知识分子对现实的看法，连同小说家所进行的艺术探索，在文艺领域又活跃起来。

1961年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2〕}并正式上演。作品构思于1959年^{〔3〕}，完稿于1960年，演出于1961年，其间七易其稿。作品描写的是明朝历史上的清官——海瑞敢于为民请命、仗义执言的故事。1961年春节前夕，廖沫沙在一篇杂文中曾就吴晗的《海瑞罢官》论说“史”和“戏”的关系，他认为史和戏向来门户之见很深，而吴晗“‘破门而出’了，历史家却来写‘戏’，真是难能可贵”^{〔4〕}。历史剧中，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折射出作家对现实的思考，并非只是今人发思古之幽情。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历史也向来备受关注，古人所谓“匪今斯今，振古如兹”（《诗经·周颂·载芣》），也就是后来人所说的，现实由悠久的历史发展而来，未来又从现实

〔1〕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390页。

〔2〕 剧本原载1961年1月号《北京文学》，并由北京出版社1961年11月出版。

〔3〕 参见吴晗《海瑞的故事》，《新观察》1959年第13期。

〔4〕 廖沫沙《“腊鼓催春”小记》，原载1961年《北京晚报》，转引自《中国当代文学参阅作品选》（4）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96页。

延伸而去，现实包含历史的因素，正如未来也包含现实的因素。能否从历史汲取经验，是个人文化素质的重要体现。因此，无论出于深刻地理解现实，还是祈望准确地预测未来，表现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都受到读者青睐，并形成当代文艺重要一翼。《海瑞罢官》是一出清官戏，突出表现海瑞敢于为民请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无畏精神。这样的人物形象，对于现实中对“共产风”、“浮夸风”深怀不满的人们，很容易产生共鸣。但也正因为如此，历史题材所包含的现实因素，使问题变得复杂起来。如果时代为尊者讳，那就不是历史剧作家所能掌控得了的。

一方面，人们为历史人物感奋，借剧中的人物故事浇心中块垒；另一方面，为保护作家和作品，又不得不寻找各种理由去辩解。比如当时有的文章说，把剧中的“退田”、“平冤狱”与“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不合适，是把学术问题混同于政治问题，而历史剧创作纯属学术问题，不能把学术和政治混为一谈^{〔1〕}。再者说，历史学家所写剧本，并不是以历史人物简单地比附现实，任何现实都不可能是历史的简单重复，这也是史学家的学识见地所在。然而，读者对历史剧欣赏时，把历史和现实进行联想和比照，却又是谁也无法左右和限制的。在政治生活风云变幻的时代，想要作家和读者不关注与国家和个人命运息息相关的现实，就像拔着自己的头发硬要离开地球一样。因此，在当时的形势下，文艺界简直不可能有与现实政治无关的学术问题。尽管作品不是直接为现实开药方，却还

〔1〕《关于〈海瑞罢官〉问题各种意见的简介》（附编者按），1965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
参见《中国当代文学参阅作品选》（4）关于《海瑞罢官》一节，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

没能逃脱因言获罪的命运^[1]。

文学理论界的一场风波也发出信号：文艺形势不容乐观。1960年1月8日《河北日报》发表李何林的文章《十年来文学理论和批评上的一个小问题》，文章针对十年来文学界把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片面地分裂开来，把学术问题庸俗化的思维方式，以现代文学和古典文学为例，说明“没有思想性和艺术性不相一致的作品”。他说：“思想性和艺术性是一致的，思想性的高低决定于作品‘反映生活的真实与否’；而‘反映生活真实与否’也就是它的艺术性的高低；艺术性不等于描写的技巧，虽然真实地反映生活需要描写的技巧。至于‘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是任何阶级评价作品的标准，这是另一个问题，不能把它与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关系问题混淆起来，尤其不能得出一个结论：既然‘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可见政治性（思想性）和艺术性是不一致的，甚至只要政治性不要艺术性了。”^[2]当时各项工作实行调整，李何林对流行业文学界的简单庸俗化提出自己的看法，应该说是顺理成章。但他文章中关于政治与艺术关系的阐述，却被某些人指责为反对领袖人物对文

[1] 1965年，姚文元在11月10日的《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首先发难，该文在同年11月29日《北京日报》、11月30日《人民日报》和《文艺报》第12期相继转载，“很快挑起了颇为激烈的争论。不少文章就剧本的历史真实、主题思想、人物形象乃至创作方法等诸方面发表了很多不同的意见。实际上这是一个蓄谋已久的行动，并不是什么一般学术论争。随后便展开了全国性的批判运动。戚本禹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与关锋、林杰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两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更给吴晗在政治上定了性，致使不同意见偃旗息鼓。此后，数以百计的大批判文章铺天盖地压来，揭开了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参见《中国当代文学参阅作品选》（4），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1页。

[2] 李何林《十年来文学理论和批评上的一个小问题》，原载1960年1月8日《河北日报》，同年《文艺报》第1期转载，并加“编者按”说：“‘一个小问题’，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大问题，一个根本性质的问题，就是文艺与政治、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关系问题。我们不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但是认为作者所提出的问题是值得讨论的”，实际上发出了一个批判的信号。

文艺工作的指导意见。

关于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结论”部分说：

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

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舞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

又是政治标准，又是艺术标准，这两者的关系怎么样呢？政治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任何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1〕}。

四十年代初，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形势下提出的文艺作品评价标准，有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和原因，作为历史文献，它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坚决反抗日本侵略者的立场，并且十分重视文学艺术在革命中的宣传、鼓舞和教育功能。新中国初期，特别是反右

〔1〕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结论”，《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825页。

运动后，由于片面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1]，在文艺界，是不是实行“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作品衡量标准，被看作是政治立场问题，也就没有了深入讨论的余地。具体地说，如果作家创作了标语口号式的作品，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只是在形式和技巧方面有缺点、不成熟，但如果他的作品倾向，有违一时的政治潮流，那就是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有问题，作家和作品的“缺点”就可能从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这种环境下，公式化、概念化的普遍程度可想而知。

李何林的文章认为这种机械教条的观念需要调整。作为现代文学史家，李何林在文章中还回顾和分析了左翼革命文学的历史教训：

那么，内容不反动而有一定程度进步或相当进步的作品，它们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否会有时不一致呢？我认为也都一致，没有不一致的作品。例如蒋光慈的小说，乍看起来似乎它的艺术性比较低，思想性比较高：它的叙述语言里面表现了作者的进步的政治态度和一些进步的政治观点或政治概念；又每每通过人物的口说出了一些进步的政治思想或表达了一些进步的政治概念。但是它的形象和典型大多数都是没有个性的类型，不是有血有肉的，概念化的倾向是相当严重的，因而反映生活的深度和真实性都不够，对读者的教育作用和说服力量也不强，也就是思想性不高。只是概念化地表现一些正确的政治观点，并不等于思想性就高……它的艺术力量和它的思想性不高是相

[1] 反右斗争以后，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大二次会议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断言：“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参见本书第四章第一节。

是一致的。它的艺术性方面的“粗糙”和它的思想性方面的“粗糙”是相一致的。至于中国现代革命文学的初期，应该经过“粗糙”的阶段，蒋光慈的小说在初期革命文学中所应该占有的重要地位，那是另一个问题。“粗糙”是任何新生事物必不可免的阶段，蒋光慈的小说就是这种新生事物。^[1]

李何林肯定蒋光慈的小说是“新生事物”，而且左翼文学是“中国现代革命文学的初期，应该经过‘粗糙’的阶段”，因为“‘粗糙’是任何新生事物必不可免的阶段”。但他所强调的是，把左翼文学作为历史上的新生事物肯定下来，并不是连同它的粗糙一起肯定下来。恰恰由于左翼文学值得肯定，就更不应该任其“粗糙”地发展下去，因为粗糙的艺术所表达的是粗糙的思想，而“马马虎虎”的行事风格与做法，是传统农业社会留下来的弊端，不符合现代社会对思想、文艺，以及各项事业的要求。在当时，问题显然不限于文学。公社化、大跃进以来，往往片面地追求形式，大轰大嗡，只对领导和上级负责，不顾实际效果，其观念和做法，与文学上流行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李何林的文章，在当时却被当作了“反面教材”^[2]。

[1] 李何林《十年来文学理论和批评上的一个小问题》，1960年1月8日《河北日报》。

[2] 参见李何林《十年来文学理论和批评上的一个小问题》，《文艺报》1960年第1期转载时的“作者附记”：“这是我去年9月写的一篇短文，《新港》编辑部认为有问题，没有发表。我当时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就把题目改为《有没有思想性和艺术性不一致的作品？》，寄给了《文艺报》。过了几天，又去信说‘不要发表，还须修改’，就退回来了。以后得到几位同志的批评和帮助，我才认识到这篇文章的错误，我愿意把它发表出来当作反面教材，来参加反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的斗争，在斗争中我希望而且相信能够得到改造和进步，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划清界限。”同期《文艺报》编者按说：“李何林同志这篇文章，题目上标出的是‘一个小问题’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大问题，一个根本性质的问题，就是文艺与政治、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关系问题。我们不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但是认为作者所提出的问题是值得讨论的。最近《河北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正在进行讨论。我们同时把它刊载出来，希望大家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

社会生活正转向调整时期，但对李何林的批判，却表明形势不容乐观，斗争正未有穷期。

尽管如此，李何林提出的“小问题”，却在紧随其后文艺界波涌连天的知识分子写作中得到回应。《海瑞罢官》上演不久，孟超根据明代周朝俊痛斥南宋奸臣贾似道的《红梅记》改编的昆曲《李慧娘》由北方昆曲剧院上演；同年，田汉将陕西地方戏碗碗腔《女巡按》改编的历史剧《谢瑶环》上演，这出戏说的是唐代女御史谢瑶环“为民请命”，敢于向皇族贵戚斗争，最终死于来俊臣、武三思等贪官污吏刑杖下的悲剧。1961年3月至1962年9月，《北京晚报》开设《燕山夜话》专栏，发表马南邨（即邓拓）撰写的杂文《欢迎“杂家”》、《说大话的故事》、《一个鸡蛋的家当》、《王道和霸道》等一百五十多篇；1961年11月至1964年7月，北京《前线》编辑部特邀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以“吴南星”（“吴”指吴晗，“南”指邓拓，“星”指廖沫沙）为名合作写《三家村札记》专栏，发表了《“伟大的空话”》、《怕鬼的“雅谑”》、《赵括与马谡》、《专治“健忘症”》等等。这些杂文，有诸多篇什介绍历史掌故，帮助读者增长历史知识，但给人深刻印象的还是作者借古喻今、针对当时社会问题的一些切中时弊的针砭与反讽。与那种大轰大嗡形势下文化的粗鄙现象相比，这些文字与行文风格迥然相异。邓拓为1963年3月出版的《燕山夜话》合集所写的《自序》说：“我们生活在这样伟大的时代，活动在祖先血汗洒遍的燕山地区，我们一时一刻也不应该放松努力，要学得更好，做得更好，以期无愧于古人，亦无愧于后人！”

在小说领域，历史小说的兴起引人关注。如陈翔鹤的《陶渊明

写〈挽歌〉》(《人民文学》1961年11月号)、黄秋耘的《杜子美还家》(《北京文艺》1962年4月号)、冯至的《白发生黑丝》(《人民文学》1962年4月号)、陈翔鹤的《广陵散》(《人民文学》1962年10月号)、姚雪垠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一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出版)等。由于这些作品,当代文学与古典和传统的关系骤然密切起来。如果说,在五十年代,继承传统往往局限于一些具体描写,那么此时的历史小说,对传统文人的价值取向,有更深入和直接的吸纳与表现。调动传统文化资源弥补新时代的不足,也是这一时期创作“以期无愧于古人,亦无愧于后人”的应有之意。

在焦躁的社会生活中,批判修正主义已成为社会意识的新热点。此时小说家眷顾传统,看似与如火如荼的时代疏离,实际上却有意识地摆脱一种僵化的思想模式,向传统和本土寻找思想资源,继续担当起知识者的责任。因为写历史题材,小说就不必把一些应时的文字写进作品;又因为避免影射现实,描写可以流连于古代的人事之间,将小说家对现实的意见隐蔽在人物和故事中。于是不期然间,当代小说创作发生转型。正如那些表现历史题材的剧作家,多是长期从事文学和历史研究的学者。他们从历史中汲取素材,使作品摆脱领导出思路到工农兵中找素材的流行方式,作品脱去革命年代因强调阶级斗争而流行的“火气”,叙述平实,文字俭约,韵味深长,使读者为之耳目一新。与其说,这是新时代的小说向传统复归;不如说,这是小说家为突破现实题材的限制,为探索新的写作方式,又打开一扇门:文学的源泉不仅指领导规约下的生活,还有历史给作家的感悟,包括历史演义中折射的现实。

六十年代,历史题材创作中掀起的知识分子话语风潮不是孤立